

文德泉神父在家鄉的最後時光

阿瑪羅*

20世紀60年代，我在澳門認識了文德泉神父。我們在利宵中學和初級師範學校共事。他的歷史學家盛名和那時一些人的姓名聯繫在一起：查理·博克塞教授、潘日明神父和土生葡人高美士。那時，澳門知識界尚處於概念階段，尚未實際形成。然而文德泉神父是當時的表率。這位為傳播教義貢獻卓著酷愛澳門歷史的神父，是一位謙虛而魅力超凡的人。他平時喜愛穿白色教士袍，潔淨如他的靈魂和飄髻。文德泉常常以“白鬍子神父”自稱，笑卻名望。當他獨自一人在修院房間埋頭於佈滿灰塵的書堆——那些他唯一鍾愛的夥伴時，他又給自己換上了另一個綽號：“最後的幽靈”。他對這些自己賦名的綽號，竟常常樂在其中。

他作為我們的摯友，時常造訪寒舍。我寫文德泉神父時，避免重複使用那些常見素材，而盡量採用他的許多信件中極有價值的部分。

文神父寫了許多東西。在澳門，他收到不少信件。他是有信必覆的。

然而，在葡萄牙的沙維士聖塔 - 馬爾塔之家，這個他稱之為“被流放之地”，信件成了他的伴侶，是他那單調生活的唯一精神調劑品。那個時候有人造訪，確實會令他非常快樂。

在他抵達沙維士不久，我們去看望他。見到他以及聆聽到他說話時，我們的心中就充滿苦楚。這位澳門聞名的健壯的後山省人氏從來沒有病倒過，如今他的狀態卻令人難以置信：白色的長袍，艱難的步履，滿腹的惆悵，以及對澳門那塊他曾想

永埋於彼土的深深懷念。我們萬般無奈地離去，那種難言的苦痛刻骨銘心。他從澳門回來沒有隨身行李，既沒有衣物，也沒有書籍，因為他的所有行李用一個貨櫃托運，當時還未到達目的地。

當身體稍好一些，他就在住處附近散步，接着就開始寫一些短小的專欄文章。文神父似乎已經被那些曾經贊美他的人遺忘了，其中也不乏他的朋友。然而，他自己仍然認為是大家的朋友。人們之所以願意接近他，是因為他的靈魂那麼潔淨，就像後山省他的老家在多少年前曾為東方傳教事業奉獻自己的兒子那麼淳樸。

他在生病之前從澳門給我們寫了最後的幾封信。他終於在澳門十分傷感地出席了澳門回歸中國的政權交接儀式。他在一封信中寫道：

澳門，1999年8月14日。

……你可知道？今年，我要慶祝三件事。

一、抵達澳門七十五週年（1924年10月27日-1999年10月27日）；

二、神父授職禮（1934年10月29日-1999年10月29日）；

三、首次彌撒（1937年11月1日-1999年11月1日）。

為彌撒助興，里斯本音樂學院派團到澳門：努諾·維拉隆加及其夫人加蘭特，指揮阿曼多·瓦雷拉和一位西班牙男高音。

澳門感到沮喪：因中國的反對，教皇原定於11

* 阿瑪羅（Ana Maria Amaro），葡萄牙里斯本理工大學社會和政治科學高等學院人類學教授、碩士生導師。現擔任多門課程研究生導師，1998年起任里斯本理工大學、社會和政治科學高等學院中國問題研究中心主任，中國文化機構語言和文化課教授。主要研究課題為：中國、東南亞和澳門問題。其它研究課題有：哲學、中國傳統醫學、亞洲宗教文明和文化間關係的歷史比較等。



文德泉神父獲頒“帝國軍官級勳章”留影（1952年）

月赴澳門未克成行，更沒有出席12月20日的“交接儀式”，當時有一萬人被邀請參加了那些活動。

從此，鄧小平“一國兩制”的天才創造開始實施。紅龍最終穿上了一位七十九歲老人的白色教士袍……

在另外一封信裡，他跟我談到他的“快樂俱樂部”。他在澳門望廈賓館附近的散步，談到了日本客人的來訪，曾請他在澳門為他們主持婚禮，希望他給他們帶來好運。

他那種積極的生活方式所受到的關愛，以及人們對他的敬仰，隨着他離開澳門而消失了。

他的沮喪恰恰就在於那一種被拋棄的孤獨感，他覺得自己就像是在檔案館或書架上被置閒的無用之物。這種痛苦，伴隨着文神父在沙維士的最後日子。他所寫的專欄短文已無處發表。他自告奮勇舉行座談會談澳門，可是乏人出席。然而，他受人敬仰卻是千真萬確的。我們看到，有些朋友與其說促進了這種敬仰，還不如說是強加了這種敬仰。但是，文神父不需要敬仰。他需要的是友情、知音，需要感到自己還活着並可以做一些事情。

沙維士，2003年4月28日。

……我不認識的一位女士把澳門特色獎的消息通知了這裡的阿爾比諾·洛佩斯神父，我立刻對她表示感謝。這位神父把傳真交給我，我馬上回覆了這位不相識的女士，我想可能是黎祖智告訴她的。我收到了來自其它單位的祝賀，我都立刻作了回覆。

大約二十年或三十年以前，這家安老院的前主管要我給她提供安老院創始人諾瑟·皮塔·拉熱斯神父的生平資料。我於1924年就認識皮塔神父。我查閱了所有的文獻資料，最後把皮塔神父的全部生平資料寄給她。

再者：我要求我的密友吉馬良斯·羅巴托工程師贊助出版它們。他答應了，一共二十多頁。我現在才知道，大家都等待着這份出版物，但從沒有人去接觸它。有人說，他們曾經

請這位神父校閱那些材料，而直到現在仍然一事無成。我已經不能再做他們所指望的那位文學博士神父手上的工作了。這種“忽視”使我感到氣餒，因為以前我已把資料都整理出來了。我已經九十一歲了，不可能再重新開始了。

沙維士，2003年4月26日。

……我確信已對他說過出生在澳門的諾昂·巴蒂斯塔·古特雷斯神父逝世了。諾昂·蘇薩神父也在澳門出生，許多年以前就在路環的聖路易斯庇護所。他雙目失明，不能走路，受盡痛苦的磨難。他曾是我的修院學生，也是我在新加坡時的助手。

我和大家在那裡的餐廳度過了我的生日，許多澳門和葡萄牙的朋友給我寄來了信。我將在這長長的走廊裡漫步，向關在鳥籠裡的金絲雀致意。我最好能往藍天飛翔。我也收到了韋奇立將軍及其夫人的祝福，他們從未把我遺忘。

我收到了寄自布拉干薩的兩本書，其中《這就是若昂二十三世》我已經讀了兩遍，另一本是格德斯·德·阿莫林的書，我正在讀。

還有，我們在教堂進行所有的禮拜儀式，來的人越來越少。一個多月來，戰爭始終是電視的主題。

沙維士，2003年6月3日。

……眾所周知，我發表了多本關於我們在東方的歷史著作，我把它們全部送給了澳門科學文化中心。我在這裡甚麼都沒有了，沒有人對東方的歷史感興趣。

在我抵達不久就向修女們提出舉辦關於葡萄牙在東方的講座，但沒有人給我答覆。如今，祇有阿瑪羅女士對此感興趣，她始終表現出不懈的努力。

若阿金·普拉達祇對歐元感興趣，把時間都耗費在里斯本的銀行裡。我很少見到他。他有一位崇拜者，每當他來這裡時，我們都要與阿瑪羅長談。

至於我的記憶力，我已經九十一歲了，對





文德泉 1923 與父母及弟妹在家鄉合照

此我已回天乏術了。但我每天要寫一篇文章，放在文件夾裡。我給波爾圖寄去了七十多篇，但毫無回音。因此而一事無成。

8月份的下半月，我在北方。8月23日，我去沙維士看望文神父。他見到我顯得十分高興。

他重復了幾次這樣的話：“我以前在天堂，現在卻掉進地獄！”這也許就是我們聽到的文神父的最後話語，如此憂鬱而痛楚。

在我的懇求下，他將他所寫的專欄文章及遺囑交给了我：

地球上涵義最深刻的三個詞——

這些詞語曾對那些最優秀的聽眾說過。兩千年來，它們經過最文明而神聖的靈魂深思熟慮之後，留存於世。

我坦率地說，我每天都在思考它們。而它們每天都感動着我，賦予我生活的勇氣。

這些詞語就是——

“我們於此世間生活，於此世間行動，於此

世間存在。”

這話語是對誰而言？對上帝。

我們生活於此世間，是上帝賜予我們生命，並且每時每刻不斷地賜予。

我們行動於此世間，是上帝賜予我們力量，使我們可以行走、呼吸和活動肢體。

我們存在於此世間，是上帝延續了他所賜予我們的生命。

祇有當手指碰觸琴鍵的時候，鋼琴才發出音響，否則將是絕對的沉寂。

如果上帝撤回他的手，我們將回歸於塵土。

無人能將自己的生存延長一分鐘。

我們每天最好能夠思索聖保羅主教在古希臘雅典最高法庭上所說的那席話。正是它們，促使迪奧尼西奧·阿埃羅巴吉塔成為天主教信徒。

而我們，甚麼時候才能夠成為信徒呢？

本人於此立下遺囑：

謹以聖父、聖子和聖靈之名義——

我所有的一切，都是從上帝那裡取得的；為



文德泉神父與朝鮮族教友在大三巴合影（1998年）

了上帝，我願把所有這一切，都贈予貧苦大眾。

我相信，自己沒有虧欠任何人。

我在沙維士的聖塔·馬爾塔之家已經有一年時間，我從澳門寄給該院的大約 60,000 元澳門幣應該到了，這些錢可用於支付我已經開銷或將要支出的花費。

至於提及本人的家庭：我祇有一位妹妹，名叫本溫達·特謝拉，她是布拉加聖心瑪利亞修院的修女。因此，她不需要甚麼，況且我已支付了她所有的學費。

我還有一名侄女，名叫瑪麗姬·特謝拉·科爾沃，與一個名叫科爾沃的男子結了婚。她已經接受了我父母的遺產，所以她也不需要甚麼了。

我在弗雷舒有幾筆財產。我以弗雷舒教區神父的名義，把這些財產留給窮人。譬如，在瓦雷馬德拉和托馬以及其它地方，所有這一切，連同這些財產的收入，都留給弗雷舒教區，用來贈予窮人。

我平時穿的白色長袍留給聖塔·馬爾塔之

家的阿爾比諾·洛佩斯神父。

耶穌聖心銀像留給我的妹妹本溫達。

後山省市政廳徽章以及布拉干薩主教徽章則留給弗雷舒博物館。

我沒有給這個世界帶來甚麼，所以我也不想從這個世界帶走甚麼。

這樣，我上天國就更加輕快了。

我指定我的妹妹聖心瑪利亞修院修女本溫達·特謝拉為本遺囑執行人。她和別的修女一起寄居於布拉加。

接着在27日，他又給我寫了一封信：

沙維士，2003年8月27日。

尊敬的阿瑪羅女士：

你和朋友保羅·德·梅內塞斯及其夫人的造訪，對孤獨的盲人而言，就是一種安慰。阿瑪羅女士一直與我在一起，並且鼓勵我，使我

能夠繼續寫文章。這正符合我的強烈願望。但是在這裡，一切皆事與願違。日常安排皆與我的工作有所牴觸。服務員在上午要做清潔工作，我要呆到接近午飯時分才能進我的房間，而整個下午卻都被教堂事務安排得滿滿了。

我已別無它法：我給澳門留下了6,000份“小文稿”。我的朋友韋奇立曾將此事委託給新聞部門出版，但他們甚麼都沒有做。

另外有一個人收集了我所有的文章，為此做了許多工作。他就是安東尼奧·巴蒂斯塔教授。他盡了最大的努力收集我的文章，但最後還是放棄了。阿瑪羅女士或者保羅·德·梅內塞斯先生可能與他接觸過。他是一位出色的天主教徒，是我非常要好的朋友。我相信他仍然是唯一能夠收集我所有文章的人，他對此項工作曾經表現了極大的熱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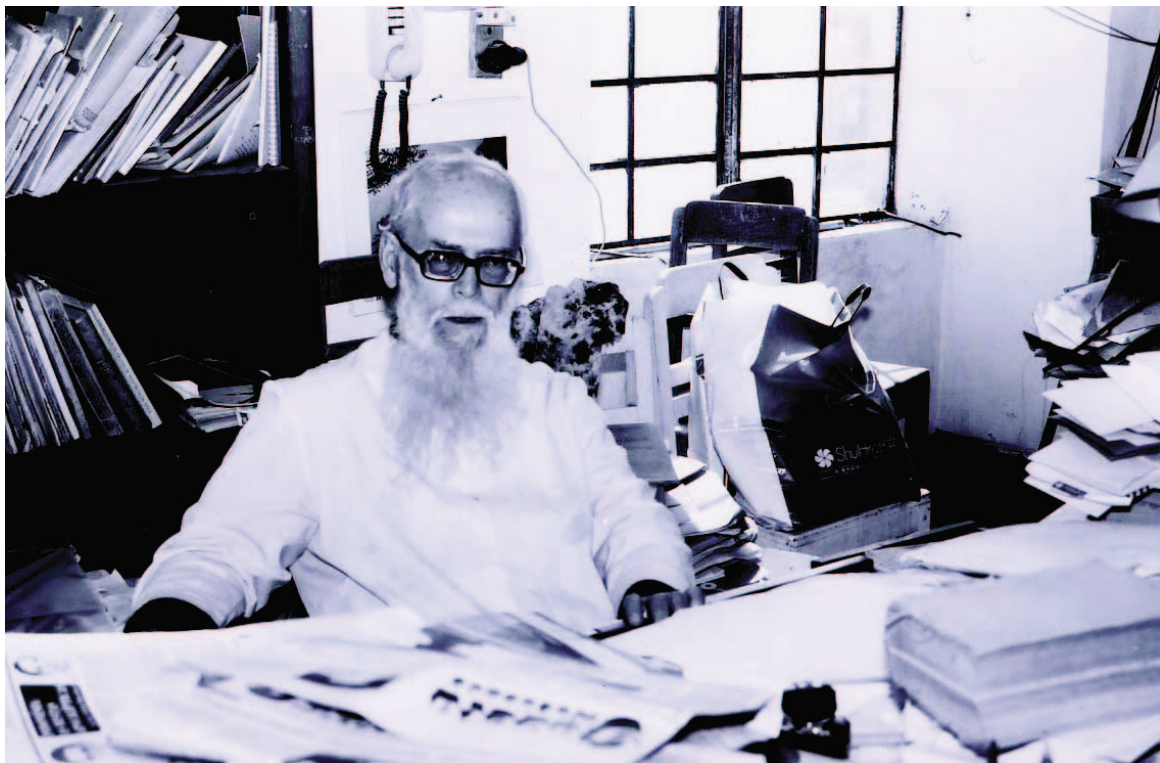
我在這裡已無能為力，但我對有人終於會



文德泉神父於常年寄宿和寫作的澳門聖若瑟修院教堂前留影（90年代）



文德泉神父在澳門聖若瑟修院花園大樹前留影（1970年）



夕陽無限好，尤貴近黃昏。文神父晚年仍孜孜不倦遊牧於書海名山。（20世紀末年照片）

承擔這項工作感到無限的高興。請把這事轉告我的朋友，……我認為他是最恰當的人選。

我再次感謝兩位朋友的來訪，是他倆給我帶來了無限的歡樂。

謹致以摯友的無限感激

文德泉神父

我給他回了信，並寄給他一本日誌冊，希望文神父能夠每天記錄下零星的回憶，用以代替那些專欄文章。

9月15日，大約正午時分，我從一份電報裡驚悉文神父逝世的訃告。

嬭嬭們告訴我全部事情的經過。這一噩耗來得太突然了，而且如此殘酷無情！

兩天之後，我收到了他最後的一封信：

沙維士，2003年9月12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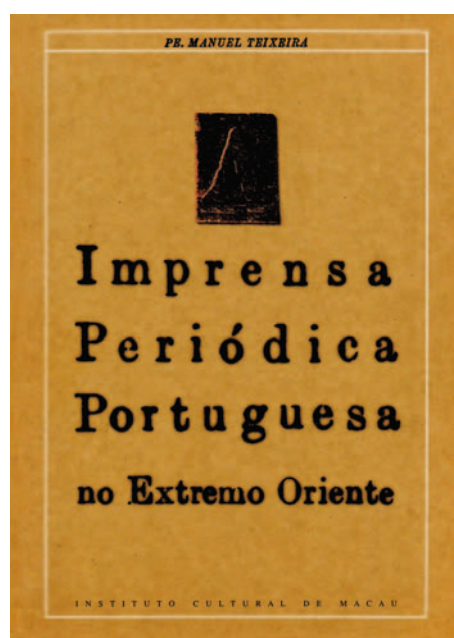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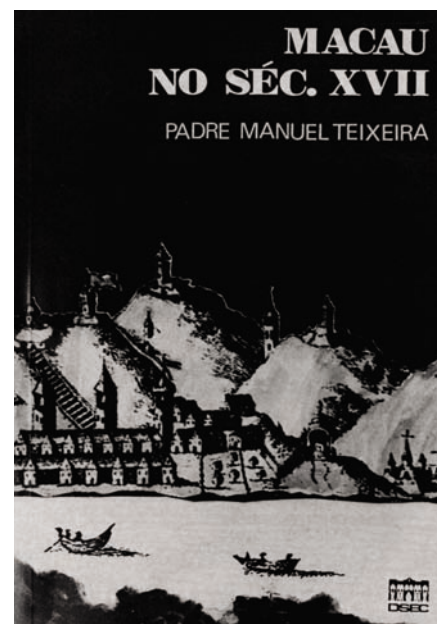
……堅持才能獲得一切。這體現在我的好友阿瑪羅女士身上。

儘管這裡的老人院不可能給我安排時間，但我還是要繼續填寫日誌本，勾勒我此生可憐的輪廓。

就是這樣一封非同尋常的信，深深觸動了我。文神父終於找到了風燭殘年頑強地生存的理由。

這位收集和撰寫了大量文獻資料的歷史學家，給我留下了這麼一份臨終文獻。他是在生命彌留的最後幾天將它及其它文件一起留給我的。

歸祖勤譯



文德泉神父著作（部分）封面